

《戊戌纪略》的刊布与张謇的君宪情结*

李永胜

内容提要 学界长期流行一种说法,袁世凯《戊戌纪略》首次刊行于光绪宣统之交袁世凯被罢回籍前后。事实上,《戊戌纪略》大约于1925年由张謇所创办和经营的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以《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为书名首次铅印出版。1926年2月上海《申报》再次刊布《戊戌纪略》。张謇是清末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后被迫接受共和政体。晚年的张謇对于民国建立以来党派纷争、军阀混战的动荡局面颇为失望,对于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忧心忡忡。他为中国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深感惋惜,认为以君臣父子秩序为核心的孔孟思想才是救时之方。《戊戌纪略》宣扬的忠君孝亲思想适应张謇等人精神需求,当为张謇刊印该书的动因。

关键词 袁世凯 张謇 《戊戌纪略》 君主立宪

袁世凯所撰《戊戌纪略》,一直是学界研究戊戌政变所依据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刘凤翰认为,南通翰墨林于宣统元年最早印行了《戊戌纪略》。^① 笔者近期先后在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发现了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印行的《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一书。该书首次刊布《戊戌纪略》,其印行时间大约是在1925年。时隔不久,1926年2月上海《申报》再次刊布《戊戌纪略》。本文将对苏沪士绅两次刊布《戊戌纪略》的具体情况以及张謇印行《戊戌纪略》的思想动机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项城自撰戊戌纪略》的内容、责任者及印行时间

1926年,罗家伦曾委托蔡元培给张一麀写信询问《戊戌纪略》的来历。1926年9月2日张一麀给蔡元培回信说:

关于戊戌一节,系光绪末弟以袁将返里(即伪称足疾之后),直以此事问之。袁曰:“吾有日记当与汝”。翌日以此相授。弟因不足解纷,终未宣布。去年况夔笙来苏,弟以此与之,已

* 本论文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研究”(NKZXA1208)资助。

① 刘凤翰:《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9—188页。

编入申报丛话中……其先时付印者在南通书林有一单行本，即费君（仲深）向弟处抄录而流至南通者也。^①

张一麀定稿于1930年的《古红梅阁笔记》有云：“戊戌一案，余入幕后未尝一言询及项城，及其罢官时乃询及之，项城曰：‘此事余有记载，他日当寄汝一观。’余回南后寄来一册。因其已往事，故未宣布，后见南通翰墨林已排印出版，今不赘。”^②

1935年，张一麀为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所作“眉批”写道：“戊戌之变、癸卯之役，余在幕府时，始终未敢请问。直至宣统元年将归河南之际，乃面问颠末，袁氏有手书一帙，后为南通翰墨林出版。”^③

张一麀在上述三处所提到的南通书林（翰墨林）印行的袁世凯“日记”、“记载一册”、“手书一帙”，即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所藏《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一书。该书开本很小，高度为147mm，宽度为111mm。全书为铅字竖式排印。书的封面有竖排书名《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书名左侧有竖排“孝若题签”四字，下盖“振兮”印章。书的扉页右半边为“项城自撰戊”五个大字；左半边有“戊纪略”三个大字，其下为“有清史料”和“之一”两列小字，“之一”下面盖“振兮”印章。扉页的文字和印章都为红色。该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共4页，没有标题，尾署“常州吴相”。这可被看作吴相为该书所写“序”。第二部分共2页，没有标题，尾署“独山莫天麟谨识”。这可以被看作该书的“跋”。第三部分标题为“李传元廉访菊农题词”，共2页。第四部分标题为“戊戌纪略”，从第1页始到第24页第4列止。第五部分标题为“自书戊戌纪略后”，从第24页第5列始至第28页止。书的封三的上部花式线框内有竖排四列两行“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八个字，下部从右往左并列“每本定价大洋四角”，“撰述者袁世凯”，“发行者濠西寓公”，“印刷者南通翰墨林”四列文字。

南通翰墨林印书局是张謇创办和经营的一家近代印刷企业。张謇的儿子张怡祖（1898—1935），字孝若。该书封面“孝若题签”中的“孝若”即张謇的儿子。

环绕南通城四周的护城河叫“濠河”。“濠西”即“濠河以西”。“濠西寓公”意思是，居住在濠西之人。书的封面和扉页都盖有“振兮”印章。吴相为该书所写的“序”里，有这样一段话：“甲子之冬，独山莫振兮君以手录项城所自为《戊戌纪略》一卷贻余。……兹振兮以活字印行俾天下共知当日情事之曲折而属余为序。”这一段话先后提到的“莫振兮”和“振兮”无疑是同一个人。吴相说“莫振兮”“以活字印行”《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一书。“莫振兮”就是该书的“发行者”，与“濠西寓公”是同一个人。

从《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一书无法知道“莫振兮”和“濠西寓公”的真实身份。1945年续编第1卷第9、10期合刊《江苏文献》刊布《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其中附录《戊戌纪略》和《自书戊戌纪略后》）。《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实际上是《项城自撰戊戌纪略》的一个修订版本，该版由《项城自撰戊戌纪略》的“序”作者吴相（字伯乔）略加修改并加了批注。《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与《项城自撰戊戌纪略》有两处重要不同。第一处不同是，《项城自撰戊戌纪略》第一部分尾署“常州吴相”的一段文字没有标题。而《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则用了“序”作标题，并且将《项城自撰戊戌纪略》

^① 罗家伦：《一个几乎被失落的历史证件——关于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2册，台北，正中书局1960年版，第1—2页。

^② 张一麀：《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③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碑海》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中“独山莫振兮君以手录项城所自为《戊戌纪略》一卷贻余”和“兹振兮以活字印行俾天下共知当日情事之曲折而属余为序”两句话中的“振兮君”和“振兮”改为“楚生先生”。由此可知，“莫振兮”即“莫楚生”。第二处不同是，《项城自撰戊戌纪略》第二部分尾署“独山莫天麟谨识”的一段话没有标题，《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在此段话前则加了“跋”作标题，并将“独山莫天麟谨识”改为“独山莫棠识”。然后，另起一列加了一段话：“此文本楚翁所撰，特假名于其长君耳。兹更正如右。伯乔记。”^①据此，莫棠，即“楚翁”是《项城自撰戊戌纪略》的“跋”的真正作者，他的名字在《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中被有意写成了其儿子（“长君”指成年的公子）“莫天麟”的名字。

莫棠（1865—1929），字楚生，贵州独山人，晚清大儒、藏书家莫友芝之弟莫祥芝（1826—1889）的第三子，著名藏书家。“莫振兮”和“濠西寓公”即指莫棠。莫棠父亲莫祥芝曾任江苏太仓州知州，生前与张謇是密友。莫棠晚年长住南通，与张謇过往甚密。

为该书作序的吴枏（1881—1942），江苏常州人，字伯乔，又字我尊，清末民初著名戏剧家。民国年间，应张謇之邀，创办并主持南通伶工学社多年，直至张謇去世。

该书“题词”的作者署“李传元廉访菊农”。廉访，即按察使。李传元（1854—？），字仲钧，号橘农（菊农），江苏新阳县（今江苏昆山市）人，他在清末宣统年间出任过浙江按察使。他和张謇是多年老友。^②

为南通翰墨林书局提供《戊戌纪略》者费树蔚（1883—1935），字仲深，号韦斋，祖籍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他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既是连襟，又是儿女亲家。经张一麀引荐，曾在袁世凯幕中任职。民国初年曾任肃政史。后长年居于苏州。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张謇是《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一书的印刷者。为该书作序、跋和题词的莫棠、吴枏、李传元都是张的密友或食客。张謇无疑是刊印此书的最核心的人物。书中不出现张謇的名字应当是有意掩饰。《项城自撰戊戌纪略》鼓吹忠君思想。在民国建立后，公然宣扬忠君不合时宜，张謇有必要隐去自己名字。

吴枏在“序”中说，他甲子年冬从莫棠那里得到袁世凯所撰《戊戌纪略》，“岁暮”将其带到上海，曾给为袁世凯担任过秘书工作的步林屋看过。后来，莫棠为出版《戊戌纪略》找他作序。因此，翰墨林印行《项城自撰戊戌纪略》，是在甲子年“岁暮”以后。甲子年最后一天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即1925年1月23日。“岁暮”时间范围难以精确确定，此书的印行时间大约应在1924年12月底以后。1926年9月2日张一麀致蔡元培信中说，南通翰墨林印行《戊戌纪略》单行本在《申报》刊行《戊戌纪略》之前。1926年2月2日、4日、6日、8日《申报》的“餐樱虎漫笔”栏目连载《戊戌纪略》。南通翰墨林刊印《项城自撰戊戌纪略》的时间大约应在1925年1月至1926年1月之间。

二、《申报》再次刊布《戊戌纪略》

在《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一书印行后不久，《申报》再次刊出《戊戌纪略》。《申报》刊载《戊戌纪略》与南通翰墨林刊印《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两件事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① 《江苏文献》所载《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中的“序”和“跋”，又见姚伟整理《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近代史资料》总8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243页。姚伟整理此文删略了“题辞”、《戊戌纪略》及《自书戊戌纪略后》三部分内容。

^② 1898年5月8日，张謇结束数年之久的丁忧假期返回北京后，委托李菊农为其办理销假事宜。参见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08页。

1926年2月2日《申报》“餐樱庑漫笔”栏目在刊发《戊戌纪略》前加了编者按语称：“乙丑岁暮薄，游吴间，得晤张仲仁先生（一磨）。先生经济文章，冠绝并世，当日尤熟闻掌故，顷以项城戊戌日记见贻，殊多考鉴，为移录于左。”乙丑年，即1925年。“薄”即“迫近”的意思。“游吴间”，即再次到苏州。这个按语的作者况周颐（1859—1926），字夔笙，晚号蕙风，室名“餐樱庑”，广西桂林人。况周颐说，《申报》所刊《戊戌纪略》由张一磨提供，与张一磨1926年9月2日给蔡元培信中所述完全吻合。

莫棠在《项城自撰戊戌纪略》“跋”中说“此写本出吴江费氏，盖仲深先生树蔚亲受诸项城者”。这也就是说，南通翰墨林所刊《戊戌纪略》由费仲深提供，而费仲深亲自从袁世凯那里接受《戊戌纪略》。

张一磨致蔡元培信和莫棠所作《项城自撰戊戌纪略》“跋”都说南通翰墨林版的《戊戌纪略》是由费仲深提供的。但是，费仲深是从哪里得到《戊戌纪略》的？对于这个问题，张一磨的说法与莫棠的说法产生矛盾。张一磨说，《戊戌纪略》是袁世凯罢官回籍前后交给他的。费仲深从他那里抄录《戊戌纪略》并流传至南通，由南通翰墨林书局刊行。莫棠则说费仲深的《戊戌纪略》“亲受诸项城”。笔者认为，张一磨所说较为可信。费仲深“亲受诸项城”的话并非费仲深自己所说，经莫棠转述容易发生偏差。费仲深即使经手张一磨得到袁世凯《戊戌纪略》，也可以算是“受诸项城”，似不必过于计较“亲”字。而且，况周颐与张一磨、费仲深都是朋友，他说《戊戌纪略》来自张一磨而没有提到费仲深。^①考虑到苏州和南通士绅之间的密切联系，张謇、莫棠等人似不应不知道《戊戌纪略》的真正源头，莫棠说《戊戌纪略》得自费仲深而不提张一磨可能是有意隐讳。

《申报》刊发《戊戌纪略》时，只字不提南通翰墨林已将《戊戌纪略》刊行之事。张一磨致蔡元培信中说，《申报》和南通翰墨林所刊《戊戌纪略》都是由他提供原稿的，这就将苏沪士绅两次刊印《戊戌纪略》的举动联系起来。

张一磨（1867—1943），字仲仁，江苏吴县（今苏州）人。1903年中经济特科，分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处任职。宣统皇帝即位后，因袁世凯被逐回籍，张一磨解职回乡。民国初年，张一磨再度充任袁世凯幕僚，1915年任职教育总长。1917—1918年间曾任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后张一磨辞职回籍。张一磨与费仲深住所相邻，关系至为密切。

张謇和张一磨两人谊属江苏同乡，有着多年的私交和公谊。民国初年，张謇任农商总长，张一磨任总统府秘书和政事堂机要局长，两人因为工作关系常有联系。袁世凯称帝，二人同持反对态度。回籍后，张一磨住苏州，张謇住南通。他们为江苏地方事业奔走联络，常有来往。张謇和张一磨与《申报》主人史量才交往颇多。《申报》编辑人员况周颐与张一磨、费仲深也有联系。

南通翰墨林印书局《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一书印量不多，发行范围有限，难以产生大的影响。以张謇、张一磨为代表的苏沪士绅将《戊戌纪略》在《申报》再次刊出，使《戊戌纪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申报》所刊《戊戌纪略》没有《自书戊戌纪略后》部分。

三、张謇刊印《戊戌纪略》的思想动机

张一磨收藏《戊戌纪略》多年，本来早就可以将其公诸于世。张謇和张一磨为什么偏偏选择在1925年刊印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呢？张一磨三次谈到刊印《戊戌纪略》一事时都回避了这一问

^① 况周颐在1926年2月19日《申报》“餐樱庑漫笔”栏写道：“吴县费仲深（树蔚）寄贻近诗。”由此可见，况周颐与费仲深有书信往来，关系相当密切。

题,迄今学界也没有发现张謇有关刊行《戊戌纪略》之动机的言论。但是通过考究张謇在1925年发表的有关言论,或可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1925年,张謇一反民国建立以来认可民主共和政体的态度,重弹清末君宪救国的老调,将民国以来的动荡不安归咎于君主制的废除,主张孔孟思想救世。促使张謇发表这种言论的时代背景是五卅运动的发生。

孙中山在广东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引起张謇的警惕。1925年前后,张謇听说“南方政府已和苏俄一鼻孔出气”,“赤化的意味,一天一天的深了”,就派人到广东实地考察了三个月。派去的人回来告诉张謇,广东政府“非但不是共产,并且还要驱除苏俄顾问”^①,这使张謇略感心安。然而,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却给了张謇极大的刺激。

1925年5月上海英租界发生的五卅惨案,激起全国范围的群众抗议运动,形成了国民革命的高潮。张謇召集南通各校学生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张謇竭力批判五卅运动提出的反帝主张。他说:“今既与日英有恶感,而又挑动美法,此义和团之办法也。试问有能力将世界各国灭去否?”张謇对于“平等共产之说”尤为不满,他说:“人之生活,全在勤劳,自身不在正当事业上努力,而希图取给于人。即能如愿以偿矣,其人格为何如耶?”^②他认为贫富之别如同山海有别一样是天经地义之事:“夫山不可不使之高,海不可不使之深,今欲将山海削于平,可乎不可?”^③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南通学生举行罢课等声援活动。张謇发表《正告南通自立非自立各学校学生及教职员》一文,告诫学生和教师安心教学,不要“盲从政党之行为”。^④太虚法师在北京发表文章,以佛教教义评论社会主义学说。太虚的言论传到南通后,张謇立即发表题为《太虚以佛法批评社会主义录答问》的长篇论文,攻击社会主义学说。^⑤张謇还两次在南通各界举办的暑期讲习会发表演说,攻击五卅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⑥张謇甚至将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兼爱的墨家思想和崇尚个人主义的杨朱思想看作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写道:“吾今而知孟子以杨墨家言,充类比于洪水猛兽之非好辩也……杨墨学说,宁料其流而至于无父无君;革命风潮,亦不料其变而至于害民覆国。”张謇认为孔孟思想才是救万世之方,“吾故叹孟子之识微,而孔子之时中,为万世不易之正轨也”。^⑦

张謇是清末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发生后,他很快拥护民主共和,对南北和谈施加影响,支持袁世凯担任南北统一后的大总统。但他的这种转变很大程度是出于对形势发展的无奈。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只有清帝退位,才能使全国秩序稳定下来。张謇并未心悦诚服地赞成民主共和制度。他在1912年1月写成的《革命论》,就对共和革命的前途表示了疑虑。^⑧民国建立以来的动荡局面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加剧了张謇对共和革命的怀疑和不满。他慨叹:“当主革命者,鼓动国人趋向一致之时,欲破君主之说,并破忠君之说以为前趋。不知君之义不主专制,忠

①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271页。

② 张謇:《为沪案召集学生演说》(1925年),《张謇全集》第4卷,第217页。

③ 张謇:《向南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及教育界人士之演说词》(1925年6月6日),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1卷,第609页。

④ 张謇:《正告南通自立非自立各学校学生及教职员》(1925年),《张謇全集》第4卷,第212页。

⑤ 张謇:《太虚以佛法批评社会主义录答问》(1925年),《张謇全集》第1卷,第617—623页。

⑥ 张謇:《暑期讲习会演说》(1925年),《张謇全集》第4卷,第213—214页;《暑期讲习会第二次演说》(1925年),《张謇全集》第4卷,第214—216页。

⑦ 张謇:《释惑》(1925年),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193—196页。“识微”,指看到事情的苗头而能察知其本质和发展趋向。“时”指与时势一致;“中”,指中庸之道。根据张謇《释惑》一文的思想内容和张謇的思想状况,笔者认为该文应当写作于五卅运动发生之后。

⑧ 张謇:《革命论》(1912年),《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159—161页。

之用不尽对君……革命既成，龙鱼鼠虎，向之无聊赖无意识之徒，群以为汤网解纽，礼防尽撤，举一切暴戾恣睢，涛张顽钝，嗜利无耻之行为，举可明目张胆悍然为之，举世莫敢非而已。金以为得。人心日暗，后欲胜前，由是而某党某派，此仆彼起，又或一党一派之中，纷呶不能自一。而公妻之说，无家族之说，均贫富之说，无不假窃文明，乘时蜂起，一若惟此可以自便，惟此可以煽人从己之便。”^①五卅运动发生，张謇归咎于共和革命。他说：“同盟会主张革命，余尝谓友人曰：‘政体固应改革，但不可将国家之基础完全掀翻。国家犹一大器，不可妄动，动则恢复原状难。只可从精神法度改革，则整理自易。’但彼辈与余之希望不同，致有今日之结果。”^②张謇赞赏君主立宪制说：“立宪所以持私与公之平，纳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至颠覆眩乱者也。”^③他为君主立宪政体未能实现深感无奈和惋惜。

张謇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中刊印了袁世凯的《戊戌纪略》。袁世凯的《戊戌纪略》表达出强烈的忠君立场和思想。忠君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必要前提，也是孔孟思想的核心内容。君主立宪制和孔孟思想都被张謇当作救时之方。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大谈自己在戊戌政变中维护、调和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思想和行为。此时的张謇非常怀念清朝皇帝的统治，认为民国以来的军阀混战局面和国民革命的兴起都肇因于帝制的被推翻。因此，《戊戌纪略》非常适应张謇的精神需求。《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一书的“序”、“跋”和“题词”部分对袁世凯的忠君言行大加颂扬，对谭嗣同等维新派大加斥责。而张謇本人早有对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进行攻击的言论。莫棠、吴相、李传元等人对维新派的攻击言论，体现了张謇的观点和立场。

袁世凯《戊戌纪略》写道：“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亦非子孙所敢闻。”^④袁世凯《自书戊戌纪略后》说：“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削大难，功在社稷，亦天下之君也。况今上为皇太后命立，亦有君臣之分，且有母子之义。天下岂有无君无母之国哉。我皇上孝治天下二十余年，璇宫侍养，备极崇隆。薄海臣民，同深钦仰。为臣子者自当矢志忠贞，随时维持。固不敢议及天子累皇太后以不慈，更何敢议及慈圣累皇上以不孝。”^⑤

袁世凯打击维新派、保全光绪帝、调和帝后矛盾的做法，得到张謇等人高度赞赏。吴相所作《项城自撰戊戌纪略》“序”称赞袁世凯：“当机立断，举重若轻，为挽近绝无仅有之雄。”莫棠的“跋”中将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与曹操对汉室的忠诚相类比，称袁世凯“岂非魏武《己亥令》所谓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者耶”。^⑥李传元在“题词”中写道，“对宣室，禅繁阳，十四秋霜策功勋”^⑦，赞赏袁世凯以和平方式劝退清帝、“建立”民国之功勋。张謇反对同盟会的革命主张。袁世凯取代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是张謇当时所最乐见的结果。张謇对袁世凯确曾寄予希望，但袁世

① 张謇：《释惑》（1925年），《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194—195页。

② 张謇：《向南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及教育界人士之演说词》（1925年6月6日），《张謇全集》第1卷，第608页。张謇这里所说“国家之基础”、“国家大器”指君主制。

③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自序》（1925年12月），《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张謇全集》编者将此文写作时间标注为1923年〔《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298—299页〕，有误。

④ 《项城自撰戊戌纪略》，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印行，第23—24页。

⑤ 《项城自撰戊戌纪略》，第24—25页。

⑥ 魏武，指曹操。曹丕称帝建魏后，尊曹操为武帝。曹操基本平定北方后，发布《十二月己亥令》，其中说：“袁绍据河北，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页。）莫棠把袁世凯对待维新党人之做法喻作曹操破灭袁绍之举。

⑦ “宣室”指宫殿。“对宣室”，即在宫中召对。“禅繁阳”，指公元220年曹丕在繁阳建筑受禅台接受汉献帝让位。十四秋霜，指民国建立历十四年。整句话意思是，袁世凯用和平方式劝退清帝，建立民国历十四年。

凯复辟帝制等行为令他失望和惋惜。^①

袁世凯《戊戌纪略》斥责谭嗣同离经叛道、无父无君。《自书戊戌纪略后》写道：“谭嗣同等煽惑构乱，离间两宫，竟欲陷君于不义，詎为天理所能容。……该党无礼于君，予为鹰鹯之逐，亦人臣之大义。”^②袁世凯的这番表述颇合张謇等人口味。他们呼应袁的言论，对维新派大加责骂。吴枏的“序”，攻击谭嗣同差点置光绪于死地，可谓“不忠”，他说：“余维当日变政非不可行，特操之太切，遂遭覆败，几致德宗于危。浏阳（指谭嗣同）诚不能辞其咎。”吴枏还指责谭嗣同变法维新的动机是谋取高官厚禄以提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其变法措施首先影响到其父职位，可谓“不孝”。他说“然浏阳所以急急于功名者，则以为庶母所轻，又重有妻子之戚。欲一朝致身通显以炫赫家庭间，故裁冗员而首裁其父湖北巡抚之缺也。”对于谭嗣同和光绪帝的不幸遭遇，吴枏不但不寄予同情，反而指责其罪有应得，他说：“君若臣徒以不能忍于骨肉之间，致为孤注一掷。其一以杀身一以幽死也，固所甘受。”^③也就是说，光绪帝和谭嗣同一样，对于骨肉之间的矛盾不能忍受，孤注一掷。谭嗣同惨死、光绪帝终生幽禁郁郁而终，他们自作自受。

李传元所作“题词”讥讽维新党人不自量力、急躁冒进导致党人被杀、流放、逃亡的结局，他写道：

祸水萧墙，叹纷纷钩党，草草兴亡。^④ 吹豪移九鼎，暴骨吊三殇。^⑤ 竹马戏，孽狐祥，走我侯王。^⑥ 使江陵生于今代，早殒颜梁。^⑦ 袖中金紫堪伤，笑兵符急遽，墨敕苍黄。^⑧ 朝衣西市泣，关塞朔风凉。^⑨ 对宣室，禅繁阳，十四秋霜策功勋。永贞刘柳，合配蒸尝。^⑩

事实上，张謇本人早在戊戌年就对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深感厌恶。张謇自称，1898年7月他在北京期间听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变法，“曾一再劝勿轻举”。^⑪ 1898年9月30日，张謇得知谭嗣同等人被杀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谭好奇论，居恒常愿剪发易服效日本之师泰西，不知波兰、印度未尝不剪发而无补于亡也。又常创杂种保种之说，谬妄已甚。”^⑫到了1925年，张謇等人攻击谭嗣同、康有为等人，当有借古讽今之意味。在他们看来，鼓吹共和革命、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者，如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一样离经叛道。

① 张謇得知袁世凯死讯后在日记中写道：“三十更事年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张謇全集》第6卷，第717页。）“三十更事年”似应为“三十年更事”，指袁世凯经过三十年官场的历练。“三千年未有之会”，指君主制向共和制转变、袁世凯担任总统为袁世凯施展才能提供了三千年难遇的机会。

② 《项城自撰戊戌纪略》，第25—27页。

③ 《项城自撰戊戌纪略》，吴枏“序”，第3—4页。

④ “祸水萧墙”，指内部发生祸乱；“钩党”指同党。该句话意思是，由于袁世凯告密，维新党人得势时间不长，即纷纷败亡。

⑤ “九鼎”指皇权。这句话意思是，维新派志在取得朝廷最高权力，结果却导致多名党人被杀的结果。

⑥ “竹马戏”，指一种将竹子当作马骑的游戏。“孽狐”指邪恶的狐，其出现常被认为是“祥”（凶兆）。“侯王”指外逃的康有为等人。这句话意思是，康梁党人利用袁世凯军“围园杀禄”的计划如同将竹子当马骑的儿戏。康有为等人发现情势危急，急忙外逃。

⑦ “江陵”代指关羽。颜良（良）为袁绍手下大将，为关羽所杀，这里指代荣禄。整句话意思是，维新党人没有得到像关羽一样的人相助，可以为他们杀掉荣禄。

⑧ “金紫”指代地位很高的官职。“袖中”，是快要到手的意思。该句意思是，谭嗣同访袁，为了谋取高官厚禄。眼看快要到手的一切永远失去了，令人可惜。“兵符”此处意思类同“墨敕”。据《戊戌纪略》，谭嗣同向袁世凯出示了用墨笔书写的上谕，即“墨敕”。“苍黄”同“仓皇”，仓促而慌张的意思。整句话意思是，谭嗣同奉谕调兵，其仓皇失措之态令人感到可笑。

⑨ “朝衣”即官服，指代被杀的维新官员。“西市”指刑场。这句话意指，维新党人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边疆。

⑩ 蒸尝，指祭祀。本句话意思是，康梁维新党人可以与唐朝永贞革新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一起配享祭祀。也就是说，维新党人和永贞革新派一样，是失败的改革者。

⑪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3册，第85页。

⑫ 《张謇全集》第6卷，第414页。

结语

张一麇几次提到南通翰墨林印行袁世凯《戊戌纪略》一事,却没有说出刊行的具体时间。不过,张一麇两次说过,他得到袁世凯交来的《戊戌纪略》时,当时并未将其公布。张给蔡元培信中说:“弟因不足解纷,终未宣布”^①;他在《古红梅阁笔记》中又说:“因其已往事,故未宣布”。^②刘凤翰先生未见到过南通翰墨林刊印的《戊戌纪略》原书,又忽略了张一麇所说“未宣布”的话,误认为《戊戌纪略》宣统元年在南通出版。这种说法影响学界多年。《项城自撰戊戌纪略》的发现,确证南通翰墨林于1925年刊行《戊戌纪略》,并非宣统元年。1926年2月,以张謇、张一麇为代表的苏沪士绅再次将《戊戌纪略》发表于《申报》以扩大其影响。

以张謇、张一麇为代表的苏沪士绅作为清朝的遗老,对前朝还存在某种程度的怀念。历史上,张謇、张一麇、费仲深等人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他们虽然反对袁世凯的称帝行为,但他们并不赞成全盘否定袁世凯。正如张一麇所说:“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此论世之难也。”^③民国建立以来党派纷争、军阀混战的局面令他们失望,使他们不免产生今不如昔的感慨。1925年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更增加了他们的忧虑之情。他们认为君主立宪运动的失败、孔孟思想的沦丧是造成社会动荡、异说迭起的原因。张謇1925年发表的多篇言论,典型地反映出苏沪士绅的这种心理。

时局的发展悖于张謇等人意愿,他们感到无奈,只能借古述怀,寻求精神慰藉。于是,他们刊印《戊戌纪略》,颂扬袁世凯的忠君言行,表达对君主立宪制的赞赏和惋惜;贬斥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无父无君、急躁冒进,影射攻击主张共和革命、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激进分子。

[作者李永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300071]

(责任编辑:胡永恒)

① 罗家伦:《一个几乎被失落的历史证件——关于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2册,第1页。

② 张一麇:《古红梅阁笔记》,第48页。

③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第12页。